

文化基因背景下的西方规划师价值观分析

——兼论城市人理论

魏伟_谢波

[摘要]: 以文化基因的视角分析西方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基本价值观,即基于“个人”的自由价值观,基于“泛人”的平等价值观,基于“理性”的理性价值观,并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互视,提出基因不同的自由价值观、内涵不同的平等价值观以及取向一致的理性价值观,分析“城市人”理论在平等和理性价值观下的意义。

[关键词]: 文化基因; 梁鹤年; 城市规划师; 价值观; 城市人

The values of western plann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DNA

【Abstract】The urban planning value of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is analyzed from the cultural DNA persp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individualism and civilized consumption, which include the values of personal freedom, public equality, rational reason. Then this article proposes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s and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Homo unbanicus”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values of equality and reason, by comparing the urban planning value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DNA, Hok—Lin Leung, Urban planner, Value, Homo unbanicus

“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①在其著作《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1]中提出的解读西方文明要义的重要观点。书中提出了产生于现代前、根植于希腊理性、罗马秩序和基督太平的“唯一,真”文化基因^②,和产生于现代、根植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个人,泛人”文化基因^③,两组文化基因共同影响现代西方文明的内涵。“唯一真”令西方人产生信服(忠贞与极端)、捍卫(刚毅与霸道)、宣扬(慷慨与扩张)的意识,“个人,泛人”让西方人走上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道路。“文化基因”观点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西方文明架构下的宇宙观、伦理观、社会观的观察,总结出西方人对真理、对个人、对他人的基本价值观来源;并以水为法,将文化基因溶入到不同的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历史背景与契机的容器之中,勾勒出西方文明的主体轮廓,尤其是以此透析出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内在本质:源于经验主义的“个人”基因,结合现代前的“唯一真”心态,形成个人主义,并衍生出了自由、功利主义,以个人的自由竞争和资本的自由扩张,伴随着英美的霸权走向全球,英美式的个人自由主义成为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竞争、法治、人权的认识,离不开对“个人”文化基因的解读,也离不开对“自由”为前提、“平等”为权宜的理解。

现代城市规划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无节制扩张(如城市无序蔓延、交通猛增、无限的资源需求、无度的消费增长),和由此带来的“不自由”(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公共卫生恶劣、旧城密度过大)应运而生,通过对城市土地和空间的管控与引导,实现对“公众”利益的保障,制衡自由带来的无序和不平等;同时,西方城市规划中也一直蛰伏着对“不平等”的反抗理念,既有自上而下乌托邦式、整体性甚至革命性的理性规划思考,也有自下而上消除差别、包容多元、机会均等、福利公平的诉求。总体而言,城市规划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纵剖面之一,在土地空间层面处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而城市规划师既是普遍意义上

的“人”，具备“文化基因”的基本内涵，也是专门处理这个特定关系的职业群体，在技术方法、选择方式、实现过程中有着对文明的特定解读；其价值观的反映是在西方整体文明特质的框架下，对“规划对象的认知、对规划设计的选择、对规划目标的设定”的基本态度，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展开分析。

1 基于文化基因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认识

1.1 “个人”基因下主导的需求与供给权宜平衡

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角度衡量，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是产生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根本因素。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管理制度，努力在个人“需求”和消费“供给”之间寻求权宜平衡，这和古典、中古以及近代西方的“规划思想”是本质的不同。“个人”可以看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显性基因，由此引出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等，均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存在主义等具有明确宣扬目标的形态，个人主义在西方近现代文明中无处不在且战无不胜，挖掘出了人性中最难抗拒的个人意识，并与方向性的求真目标割裂开来（这与古典时期的真理方向、中古时期的真神方向不同），以物质的拥有和非永恒的精神思考填补人的意义。这个文明基因的特征使其对土地及空间的“需求”有了物权化、扩大化、交流性、冲突性的基本特征。城市规划需要从功能及权属、交流与机会、私人与公众、自由与约束等层面对城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进行政府管理。从“供给”层面分析，消费文明不但是西方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④，而且是西方战胜其他异质文明的拳头，也是推行西方文明价值观念的利器。工业社会的生产制造业，资本社会的金融资本业，包括信息社会的信息、文化产业，都是以满足消费为基本特征，尤其是满足新消费；产品创新、质量提高、生产个性化等，包括消费观念的更新，都是在引导消费容量的不断扩大和增值。那么，城市作为消费的主要承载物理空间，就要供给满足消费的生产用地、消费空间及交流保障空间。城市规划一度是一种满足、平衡各种消费供给的城市土地空间调控制度。

1.2 “泛人”基因下规划探索的式微

西方城市规划经历了从“建筑及艺术——理性系统工程——倡导性、阶层调和”的连续演化过程，体现了现代规划的理性出发点和“泛人”基因下平等意识的不断追求。“泛人”文化基因根植于西方古代代理性和基督信仰，发端于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思索，式微于“个人”文化基因下的英美全球霸权，是现代城市规划追求“人人平等”和“公共利益”的思想基础；但也由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格格不入，以及它们分别所倡导的平等与自由理念之间存在的本质矛盾，理想式的城市规划与现实制度下的城市规划在博弈下举步维艰。基于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的文化基因特征依然明显，只是“个人”的对象有从精英小众向普通大众改变的趋势，面对了更多的个人而已，但情况可能由此更加复杂。面向公平和中下层大众的“倡导式规划已经陷入衰落^[2]”，个人主义不会因阶级的不同而可以显示出倾向于中下层大众的倡导力。消费文明内涵的不断变化，甚至信息虚拟需求大有替代传统物质需求之势，信息社会的推进更加增多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精品化的生产、个性化的消费以及无处不在的信息，几何倍数地增容了消费经济。由此带来的对传统消费空间的冲击，城市规划面对更加复杂和难以调和的供给矛盾。

1.3 规划范式的质疑与徘徊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经历了从“美学、艺术性的工作”向“理性、系统性的工作”再到“政治、倡导性的工作”^[3]，可以看作是体现自由主义“多样、差异、多元”的后现代主义对体现理性主义“简单、秩序、统一”的现代主义不断的否定与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虽然打上了“为民请命”的道德旗帜^⑤，除了能提出“质疑理性共识”的呐喊式思维，以及“包容多元”式的听上去很美但绝不可行的假设途径，其实质作用主要表现在“反”现实以及对理

性质疑，这与现代西方走上完全个人主义的道路后的心态是一致的。理性平等下的规划目标与个人自由下的现实主导之间，存在差异与距离，也一直并行，形成了西方城市规划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不同范式。

2 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下的城市规划师价值观特征

西方城市规划的目标均是以处理公共利益为核心，但因其价值观的多元化，导致出现了众多理论源头，以及多种理念下的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Peter Hall 对此开展了全面总结，从中可以看到基于平等和社会理想的“田园之城”、“底层阶级之城”，基于自由的“区域之城”、“自建之城”、“交通之城”，基于理性的“塔楼之城”，基于国家主义的“纪念碑之城”，基于资本的“企业之城”，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盛世之城”，以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挣扎的“理论之城”^[4]。以文化基因的视角，从其反映的基本价值观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2.1 基于“个人”的自由价值观

这应该是最具现代英、美文明的观念。个人主义对自由的追求衍生出自由主义，洛克的《政府论》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法治、人权上奠定基础，亦随着英美的称霸而推广至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成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生命、健康、财富（尤其是产权）的私有和不容侵犯，成为政府建立合法性的基本出发点和公共管理职能的基本内容。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管理职能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得以存在，尤其是在保障个人空间利益、调控公共空间平衡层面发挥重要作用。英国作为政府工作的城乡规划就是由公共卫生和住房政策发展而来，田园城市、卫星城镇和工业及贸易区的大力发展，也是作为扩大个人空间和缓和公众空间矛盾而推行的；美国的区域城市思想来源于苏格兰的格迪斯，在广袤的土地上和全球的资源支撑下开展着田园式、自由式、分离式、扩张式的规划引导，将自由主义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规划的自由价值观尽力保障着每一种个人的需求自由，而无论这样的满足是否带来整体社会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不自由。规划对汽车交通的优先满足就是体现“自由”的代表，当更快捷的交通移动和更大范围的空间接触成为基本需求，城市规划也搭建起了满足汽车交通的城市构架，并以此划分街区、布局公共设施；而由此带来的“自由、活力、文化”的丧失，在西方也遭到雅各布斯等人无情的批判。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强调“多样性、差异性、多元化”的时代，自由主义已经演化成为“绝对自由主义”了，对多元的认可与包容，对差异的敏感与隔离，规划成为一种“交流和斡旋”以满足更多人的自由，成为众多规划理论的价值取向。

2.2 基于“泛人”的平等价值观

相对而言，现代欧洲大陆具有较强的平等观念。欧洲的平等源于信仰，尤其是基督宗教在现代前建立的“基督太平”为泛人平等模拟了社会现实。但宗教改革之后个人意识的觉醒，发展至个人意识至上的现代主流形态，平等的观念失去了理性的支撑和信仰的归属。理性这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意识——无论是基于现代前的信仰归宿，还是莫尔的《乌托邦》所描述的古代基督团体和柏拉图“理想国”结合的理想社会，还是基于笛卡尔的人人可拥有的“天赋理念”，或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试图建立具有“共同意志”的平等社会，法国大革命用“自由”口号希望达到对不平等的反抗，直到将平等视为全人类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实现的社会目标的“共产主义”——平等的内涵虽已随着历史变迁发生改变，但平等的意识依然是西方文明无处不在的支柱观念。另外，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和基于泛人主义的平等，在“唯一真”的基因下，在失去了理性和信仰至上的现实下，二者不可能在大的社会现实中实现真正的一统；多数情况下平等和自由正如一对彼此角力的兄弟，互不相容但深知离不开对方，失去了平等的自由在西方“性恶论”的意识中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平等价值观，

正是在这样尴尬而矛盾的局面中若隐若现。乌托邦式的规划理想，在全社会的推行无疑只是个梦想，但对乌托邦的向往却一直根植于心；倡导性的公平规划思路，一度让西方规划师找到了道德的砝码和制定交流式规划的利器，但终在资金的匮乏和规划师的职业饭碗思量下淡出主流；新马克思主义式的、人文主义式的规划分析和社会呼吁，虽然让人兴奋，但期望改良社会的规划意图“早已超出了规划师应持有的职业操守，也令规划理论迟滞不前^[5]”。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规律性的博弈，西方规划的多次重要范式改变或是实践突破，均是平等的价值观对自由价值观的一种修正和反省，虽没有改变个人主义下的自由观念，但通过规划追求泛人的平等，一直以来都是现代西方文明在城市规划上的写照。

2.3 基于“理性”的理性价值观

理性观念是整个西方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特质，但在现代西方境况式微。理性也是西方自古以来最为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理性制定了恒定目标、逻辑范式以及归纳、演绎的思想方法，并由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将理性与信仰结合，终成一统；后来随着宗教改革的质疑，以及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和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对“人”的挖掘，终由牛顿、斯密、达尔文等人演绎出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科学、政治、人类演化的现代范式（当然也有康德等人对理性与经验的糅合），最终理性夹杂着现代前对“真”的探索，对数学、几何、比例、逻辑、秩序等理性思维的保持，和现代基于观察、实验的科学方法，以寻找规律和致用为原则，形成西方现代理性的综合内涵。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诸多思想源泉和实践，都深深的打上了理性的烙印。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功能理性城市 and 现代建筑运动，基于几何和秩序的原则，其对空间秩序的追求、城市功能的区分、交通的组织以及建筑的竖向延伸，虽在西方备受来自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前者批判其不识时务的抽象，后者批判其破坏城市的有机性、忽视人类的复杂性），但理性规划思想及其广泛的城市建设实践，业已成为现代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几何理性本质和现代城市的秩序理性塑造，依然是城市物质空间的主体构成。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也饱含理性主义作风，以人居模式去演绎城市发展的动力，以“静态细胞、动态城市结构”实践规划，通过人居环境要素的组织达到“最大接触、最小气力、恰当距离、优质环境”的最优人居；虽然这套被认为是“物理决定论”、“朴素机械化”的理性思维在西方“政治博弈化”的规划现实中难以立足，但该理论对城市本质的理性分析、对规划实践的清晰指导、对规划愿景明确且系统化的描述，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外，计量技术、系统理论和数学模型的成熟，西方在1960-1970年代将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纳入到严密的逻辑模型演绎当中，试图揭示城市内在的演化规律，并以此制定具有可控性的模型化规划，虽然这种理性思维同样受到质疑，但对城市规律性的解释及模型化的演绎，已然成为科学范式和数字技术高度结合的典范。

2.4 西方规划师对真的追求和反省

规划理论价值观念的多源化，以及理论流变范式的混沌特征，表面反映的是社会背景的变迁和规划需求的变化，但深层次的理由是：现代西方价值观中个人主义及其延伸出的自由、功利和资本主义及其消费文明，“无约束的自由”与“自由的相对存在”之间，“无限制的消费”与“资源的有限存在”之间，存在逻辑上和条件上的矛盾；另外，各种规划理念对“真”的坚持和宣扬，和多个“真”之间本身就存在的矛盾，形成对抗和不融。每一种价值观主导下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都可看作是西方规划师对“信仰”的追求，但在个人主义本质下的文明形态中，与之异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在局部得以实验，甚至可以示范，可一旦异质的价值观念寄希融入到整个社会实践并主导意识形态之时，那么“唯一真”基因中的极端与霸道，则会对与个人、自由、功利、消费不同的观念，予以抵制和打击。理性思想、物质决定论、系统思想、公平规划思想的相继失败（或是沉陷待浮），正是体现。但西方规划师的历史价

值恰恰在于这种矛盾运动当中，一是对“真”的不断追问和实践，二是对传统、惯性的不断“反省”。

3.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中西方规划师互视

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的主导，使得城市规划的几个基本价值观出发点“自由、平等和理性”，显示出矛盾对立的特点，此消彼长，但长期共存。中国城市规划的基本架构来自西方，但“不是以其自身来直接面对社会的，而是按照被赋予的职责来完成相应的结构需要的^[6]”，可以理解为西方现代政府管理构架与中国传统“致用”思想的结合产物，是以处理“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工具和政策。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也因为自上而下式的管控理念与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高度契合，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集中调控土地资源、公共利益诉求日益高涨的近三十年间，城市规划在中国的地位日益显著。

以上文的三个西方基本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放置到中国的文明体系当中思考，可以看到以下异同。

3.1 基因不同的自由价值观念

自由，镶嵌在个人主义下的基本观念，在中国隐现的“大我、泛人”的文化基因下（相对于西方的“我、个人”的基因），是有所冲突的；中国现代的城乡土地制度以及资源的配置模式，包括人地关系的紧张现状，都使得城乡规划的自由价值观非常模糊；对土地权、物权、人权、空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使得“有限的自由现实”和“无限的自由需求之间”，矛盾愈加深刻，而传统中缺乏对自由的理解以及无法实现西方现实中制衡下的自由，使得中国城乡规划在这个价值观的践行上显得束手无策，经常走上两极分化的尴尬境地，如城乡规划师制定的无约束的规划方案，城市管理者导控城市资源的绝对自由，民众对无约束自由的向往等等。现实约束下的自由观念，在中国城乡规划中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包括环境约束下的城乡发展目标，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城乡关系和功能梳理，以及对土地投机的约束性控制。

3.2 内涵不同的平等价值观念

平等，在中国城乡规划的现实制度和理想社会中，是有其文化基因作为基础的。但中国与西方的平等价值观念来源有所不同，中国对理想人居的追求兼有“大同小康”、“内修外敛”、“山水禅境”等传统伦理观的影响，也有历经变革后对西方追求阶级平等、民主自由、公共交流、公众参与等现代平等社会观的引入；平等应该也已经成为中国城乡规划的主流价值观念。但现实情况却不甚乐观，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侵入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当中，让城乡规划的平等性经历着种种难捱的考验：经济发展的主导原则几乎成为空间分配和资源使用的唯一砝码，消费空间（包括生产与使用）的主导地位与其他空间的从属地位极度不平等，粗放式的新城运动和举步维艰的旧城改造令规划平等失去了空间依托，房地产的全盘市场化运作令居住的平等性难以实现，缺乏制度背景和民众自我约束的公众参与令“倡导交流式的规划”流于形式。

3.3 取向一致的理性价值观念

理性，在中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是完全不同的涵义，但又有本质的相似性。西方的理性来源主要包括：秩序、恒定、平衡（如柏拉图），逻辑、因果、德行（如亚里士多德），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如亚奎那）；也有理性主义的推进：数学方法、推理分析、求真思考、清晰辨别（如笛卡尔），科学范式（如牛顿），社会契约、共同意志（如卢梭）等。而中国的理性与“道理”基本一致，老子的宇宙观（如“恒”，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孔孟的伦理观（如“城”，诚之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再

如“义”，义者，宜也），以及实用的治世法则，追求的也是恒定、秩序、平衡。理性本质的相通使得中西城市规划在理性范式上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在城市空间秩序性、结构的平衡性和目标的择善上也是异曲同工。

3.4 城市人理论框架下的理性、平等价值观念

平等价值和理性价值观在中国城乡规划中的践行，根本在于对城市本质的理性认知，和落实城市规划的平等配置。当下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总体上缺乏“规划范式理论^[7]”，即具有稳定性和普适性的规划价值观理论；西方注重科学方法和理性逻辑的基础性规划理论，在当下尤其值得品味。

“城市人”理论或许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建立于“经济人”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建于其假设演绎和逻辑推理之上）和“人居环境”理论（理性主义的规划范式）之上的城市分析砌块和规划匹配方法，给出了一套严密的逻辑方法和基于需求满足的平等规划范式：“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区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规划工作是匹配典型‘城市人’和典型人居；城市人典型与人居典型提供一个模板，帮助规划工作者衡量和评价在实际中某些居民的要求是否合理、某类人居的供给是否最优；同时也提供一个范式去帮助规划工作者提升居民的理性和优化人居的条件^[8]”。该理论在价值观上突出了理性思维与平等观念。其采用的理性思考（如直觉理念、假定原则）、逻辑演绎、观察归纳、模型总结具有理性主义的方法特征，如对“空间接触机会”、“典型城市人”、“典型人居”的认知，就完全需要以理性原则和科学方法进行归纳；在复杂、多变、多元的城市空间接触机会当中，只有通过细致大量且量化的观察、反馈、映证，通过抽象的数学和模型分析，才能寻找出具有需求共性和城市特性的面向规划的接触机会元素，如公共设施（学校、医院、超市等）的规模、空间可达性，如交通设施（换乘站点、道路等）的密度、距离，如社区的容量、兼容性、对外联系性、对内服务性等。该理论的平等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于“规划的匹配是为最多的城市人提供最佳的接触机会”，平等不是均等，也不是面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面向具有某类共同需求的典型城市人。同时，城市人理论也注重在规划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范式，避免以纯粹的“科学主义”或是彻底的“政治博弈”或是静态的“价值目标”来统领整个城市规划；在对城市人的认识论上注重观察、归纳、模型、推理的科学方法，在规划设计中正视“选择”的排他性和清晰性，在规划匹配过程中强调目标实现的阶段性和方向性，这也是“城市人”理论避免走上“主义化”道路和体现科学性、逻辑性的所在。

4 结语

西方规划师的角色，不论其是“理性精英、工程师”也好，或是“为民请命改革者”也好，或是“独善其身设计师”也好，均是西方文明体系下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价值观来源于文明特征，也试图在用自己的专业地位和影响力促进或是改良文明内涵；但一是无法超越当下西方文明的基本形态，二是源于对个人主义的本身诉求，导致规划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愈加割裂。

城市规划工作是已经深深嵌入至现代城市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方式，法律保障以及已经形成的被广泛接受的工作范式，成为其学科现实存在的依托；但试图以“科学”架构填补完成一个带有曾经以工程技术为主导、现在已明显具备社会科学特征和设计选择特征的学科，以“科学主义[®]”的思路来完成对城市规划的兜售，与学科的实际效用和目标指向有些南辕北辙；城市规划的认知过程（对规划对象的认识）、选择过程（设计方案的决策）、目标实现过程（规划价值观的推行）应该是在具有不同范式特征的思维体系下开展的。

价值观是根植于文明体系当中的，中西方文明体系的演化背景、历程的不同决定着其诸多的价值观是有巨大差异甚至是反向的；也有类似亚奎那基于“自然之法”而提出的普世价值，但在西方现在的文明体系当中已无法调解“自我保存，与人共存”的普世价值观。中西

方城市规划师的价值观，更大的意义在于“互视”，而绝不是照搬。

（本文的撰写得到梁鹤年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感谢！）

[注释]

①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和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著有《简明土地利用规划》、《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以及“旧概念与新环境”、“城市人”城市规划理论系列文章。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②“唯一，真”文化基因根植于基督信仰和希腊理性的两度结合。4世纪的奥古斯丁以基督教义过滤柏拉图的理性思想，建立了静态、悲观、求稳的欧洲文化传统，使罗马帝国盛世之后的欧洲又进入基督太平下的一统局面；13世纪的阿奎那重拾淹没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理性思想，以动态、乐观、求变的姿态期望建立更加牢固的文明构架——理性与信仰、政治与宗教、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均一统定位。

③“个人，泛人”文化基因根植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不断对抗。以笛卡尔“天赋理念”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天赋自由”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根植于法英不同的土壤，却都在用“人”的发掘重新定义西方文明的框架；于是对平等和自由的追逐，在观察的主观性和经验的不确定性下，西方思想变得愈加多元而无形。

④经济发展作为文明主体内涵又来自于“个人”文化基因，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以及英美的经济称霸，使得源于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主流意识，逐渐成为西方当下文明的显性特征。

⑤代表性的理论如 John Friedmann 的《再寻美国：一个交往式规划的理论》（1973）和《公家规划：从知识到行动》（1987），提出的“对话式的互相学习”和“社会改良”观点。

⑥“科学”可以看作是基于经验、寻求规律并带有理性假设和逻辑推理的人类认知范式，而“科学主义”则是把科学打上“唯一性、排他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方式。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 [美]迈克尔·P·布鲁克斯著，叶齐茂倪晓晖译. 写给从业者的规划理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3] 尼格尔·泰勒著，李白玉陈贞译.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4] [英]霍尔（Hall, P.）著，童明译.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5] 梁鹤年. 可读必不用之书(一)——顺谈操守[J]. 城市规划, 2001(5):61-65.

[6] 孙施文. 中国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的困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2):1-8.

[7] 张庭伟. 转型时期中国的规划理论和规划改革[J]. 城市规划, 2008(3):15-25+66.

[8] 梁鹤年. 城市人[J]. 城市规划, 2012(7):87-96.

作者简介：

魏伟，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注册城市规划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weiwei@whu.edu.cn

谢波，通讯作者，博士，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讲师，人文地理学博士后，bluesnailxp@126.com。